

# 大力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 张晓林

怎么了，通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规则。

一个是山西系统性、塌方式的腐败事件。2014年年初，伴随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的落马，山西官场进入地震期。6月19日，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和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23日，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委秘书长张春玉和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同日落马；8月29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任润厚和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2014年以来，山西省原领导班子，共7人落马，涉及“四大班子”。原省委书记和原组织部长分别被调整。中央对这个省的省级领导班子作了大幅度调整。在宣布中央关于山西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决定的干部大会上，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严肃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要求认真总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教训，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贯彻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要求，真正把党建工作责任落到实处。

其实，令人震惊的案件远不止上述三起，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都出现了一些大案要案、窜案窝案，没有人再怀疑腐败仅仅是个案或者偶发。回溯反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果，人们一方面看到了我们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鲜明态度、坚定决心和铁腕力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深感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复杂。人们常说，如果是一条鱼病了，那是鱼本身的问题，如果一条河中的很多鱼病了，那就不是光是鱼的问题了，很可能供养鱼生存的河流也有了问题。这样的现实不能不迫使人们想到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问题。应该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审视从政环境和反思政治生态问题的缘由所在。

**政治生态中的最大问题是价值观发生变化，通行“潜规则”**

从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存在的问题看，从腐败多发频发的现实看，一些地方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的问题主要是：

“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的问题。有一句调侃的话很流行，说的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暂缓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如果这只是开开玩笑也无妨，但可怕的是在一些地方变成了现实，成为干部升迁变动的潜规则。买官卖官私下交易，选人用人明码标价，钱贿、色贿、雅贿无奇不有，“带病上岗”“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现象屡屡发生。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研究也还有，但徒有虚名，只是走程序、走过场，掩人耳目。在这种潜规则支配下，正派人、老实人、埋头苦干的人则受到漠视冷落、边缘化，几乎没有发展的空间，这显然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恶化的表现。

“拉山头，搞圈子，讲亲疏，任人唯亲”的问题。一些人热衷于搞“老乡会”“同学会”，意在建立为我所用的关系网，罗织亲朋好友、故交旧部，拉拉扯扯，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规矩讲人情，四处钻营，拉帮结派，甚至结党营私，大搞“小团体”“小山头”“小宗派”，自组纪律，无视规章制度，凌驾于组织之上，立门户，拉团伙，排斥异己，搞庸俗的关系学，搞封建的人身依附。在提拔、调动、升迁，在掠取物

质利益方面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一些人急功近利，私欲膨胀，花拳绣腿，吹嘘浮夸，在统计数字上弄虚作假，信奉数字出官，官出数字。有的地方不顾经济条件和发展实际，不惜举债集资，甚至挪用救灾款，竞相建设“大广场”“大市场”“大公园”等“政绩工程”，为自己积累升迁资本。一些领导干部想方设法“策划”“包装”自己，展示所谓的“个人魅力”，表现出十足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好人主义”问题。一些干部奉行“多栽花少裁刺”的处世哲学，把“圆滑”视为成熟，把“世故”当成稳重，滋长庸俗的坏风气。“批评上级放礼炮，批评同级放哑炮，批评下级放空炮”，当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左右逢源，八面玲珑，讨巧卖乖，对上级拍好，百般献媚，投其所好；对下级哄好，不讲原则，护着顺着；对同级敷衍好，称兄道弟。遇到矛盾躲着走，是非面前不开口，任意放纵，姑息养奸，大搞低级庸俗的市侩哲学。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无论多少，都还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污染恶化的表象，这里最大的实质问题是出现“逆淘汰”现象，不是优胜劣汰而是优汰劣胜，也是人们通常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现象。“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这是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说的，反映了生物领域的规律和现象，反映了大自然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社会总体上、大趋势也应该是优胜劣汰，不断进步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往往会出现曲折、迂回、倒退，出现优汰劣胜的反常现象，这也不足为怪。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行什么样的规则。

在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思想政治领域，选人用人的干部路线，毫无疑问通行的规则是党规党法、国家的法律法规以及倡导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原则、道德规范和核心价值观。因而我们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总体是好的、健康向上的。但也不排除在一些地方、一定范围内，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及消极负面因素的侵袭和影响，通行的则是拿不到阳光下的利益交换以及权钱、权权、权色交易的潜规则。一句话，这些地方的政治原则、思想价值观发生了蜕变。一旦政治原则、思想价值观发生改变，一旦潜规则流行，选人用人、组织与个人、个人与他人、党内生活就会随之发生歪曲和颠倒，人际关系、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亲朋好友关系也会出现扭曲和变味。我们通常说的好干部、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就会站不住，叫不响；相反，弄虚作假、乔装打扮、偷奸耍滑、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人，甚至是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腐败分子，就有可能大行其道。一些地方买官卖官成风，一查查出一片，暴露出来的串案窝案、案中案，塌方式腐败、系统性腐败其源恐怕盖出于此；一些地方正派人、老实人、好干部得不到提拔反而坐冷板凳、边缘化、被排挤，其源恐怕也盖出于此。尽管党的原则、纪律、条例，国家的法律法规，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原则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讲在嘴上，但通行的已是另一套，以潜规则为标准，按潜规则办事，由此导致了从政环境、政治生态的严重恶化，出现了令人痛心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

如果说选错了人、办错了事只是河流的污

染，但如果是选人的标准、办事的标准错了，那就如河流源头的污染，带来的必然是河流大面积的污染。由此可见，政治原则、核心价值观是根本问题，是总开关，出了问题，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从政环境污染、政治生态恶化。以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地方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形式主义、奢靡之风突出，为什么有的地方相继爆出家族式腐败、地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哪里的政治原则、价值追求和取向发生变化，哪里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潜规则盛行。

## 激浊扬清，自胜者强

问题的产生本身就包含着问题的解决。一些地方的从政环境、政治生态之所以出了问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那里的领导干部出了问题。因此，营造良好从政环境，改善政治生态，首先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说实话；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照党纪国法办事；要严惩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

按照这样的思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加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力度，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进一步维护和加强了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取得新成效。我们党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不留死角，不搞例外，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党纪国法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和“底线”。全面从严治党，明显改善和净化了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实践说明：我们党有能力、有信心、有力量、有办法治好党、管好党，治理好政治生态问题，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同时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

为什么我们党能够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从严治党，认真解决政治生态中的问题，净化优化从政环境？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消极腐败的东西水火不容、格格不入，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横下一條心纠正“四风”，必须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绝不允许党内藏污纳垢，决不允许政治生态滋生毒瘤癌症。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未来还是这样。

我国古代智慧者曾经说过一句精辟的话：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意思是说，正确认识自己的人是明智之人，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人是坚强之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充分证明：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具有“自知者明”和“自胜者强”的大智大勇者。说大智，是指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在任

## E 新论

### 党建是“建”与“治”的辩证统一

近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指出，党的建设，历来重在“建”字上。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这一病症有扩散之势。仅群体性腐败的形式，就有公款吃喝式腐败、利益输送式腐败、权色交易式腐败、窝案式腐败、家族式腐败、链条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揭露和批评了种种大病、小病，把党的建设要求突出地集中在“治病”上，一再要求全党都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警醒起来，强调如果任由这些问题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刮骨疗毒、壮士断腕”来表示从严治党 的勇气、决心与信心。他还从不同角度要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要抓住要害、打到七寸、集中发力、持续用劲。要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穴位，戳到麻骨，开出辣味，起到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

党建与治病是辩证的统一。党建是常态化的任务，治病是随时随地可能遇到的事。只要有病，就要治疗。党员、干部有病要治疗，党本身在某一方面、某一机体生了病，也要治疗。要治病，更要防病。防病治病的根本措施，还是要落在一个“建”字上。从各方面把党建设好了，得病的概率就大大减少了，有病也能痊愈得更快了。所以，常态化的党的建设，要把党建与治病有机地结合起来。

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任何变化中，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自己，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之后，既看到执政党的地位，更看到肩负的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千钧重担和神圣责任，充满着强烈的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说大勇，是指党全面客观地审视自己，既看到优势、成绩、辉煌，也敢于正视和解决自身存在的包括腐败和“四风”在内的种种问题，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发展壮大自我。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不断提高，这是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格。

“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90多年的奋斗，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其间的经验和教训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还在乎把党管好、治好、建设好。这是我们党的成功之基和制胜法宝，是一条不可移易、管根本管长远的铁律。

现在，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正在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给优化从政环境、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我们必须趁势而上，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治理从政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力度，大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把党建设好，从而使党担负起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历史重任。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 E 本期特稿

治理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已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学习会研究讨论党的建设专题时，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和阐述了政治生态问题，指出要“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问题为什么会突出出来？我们的政治生态有哪些值得忧虑的现象？如何治理和建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显而易见，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认真加以思考和解决。

### 一条鱼还是一条河的问题

“政治生态”是由自然生态延伸引申而来的，是一种借喻，大致指的是从政环境、政治风气和选人用人通行的规则等。自然生态有山清水秀的问题，政治生态同样有山清水秀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个政治生态概念逐渐凸显和变热，成为社会关注和议论的话题。何以如此？恐怕不是学者专家的兴趣偏好，也不是一些人的心血来潮，确切地说是来自于现实政治生活的强烈冲击和反映，是由实践引发的一个紧迫问题。政治生活领域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些事件，不能不让人们聚焦审视从政环境、官场仕途，不能不产生某些质疑、担忧甚至震惊。几个典型案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一个是广东茂名市的贪腐案件。茂名市前两任市委书记周镇宏、罗荫国先后因贪腐落马，这两个人理所当然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涉案人员多达上百人，涉案资金上亿元，这才是令人深思发问的症结所在。本来此案已进行了处理，数十名违法官员被处刑罚、锒铛入狱，后经中央巡视组的巡查督办，又对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作了组织处理。这无疑彰显了中央反腐“无禁区、无时限”的决心和力度，但也不能不让人看到广东茂名市的政治生态出了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买官卖官成风，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价目表”。送礼送红包的民俗，变成了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障眼法”，从三五千元发展到上万元，从“请托办事”到“期权交易”，同事和上下级关系，扭曲成利益交换、金钱往来和人身依附。

一个是湖南衡阳的贿选事件。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27名市人大代表出席。在差额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现查明，有56人涉嫌向527名市人大代表中的518人行贿，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当然，这些涉案人员都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处理。但衡阳破坏选举案，公然挑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挑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挑战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涉案人员之多，涉案金额之大，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最严重的一起选举弊案，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不能不想到这里的从政环境究竟

易”……这些心态无疑都是要不得的，必须加以克服和纠正。新常态下争创新作为，需要理性积极的心态与之相适应。

首先，要破除等待观望、不求作为的心态。新常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此既不能进退失据，更不能惊慌失措，迷失方向。要看到，新常态之下，既有新挑战，也有新机遇；既会面临一些困难，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国家推出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都蕴含着无限的机遇。只要审时度势、顺势而为，勇于担当、沉着应对，就能趋利避害，化危为机。

### “新常态”要有新心态

江海

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又顺势而为、积极作为、奋发有为。

需要关注的是，“新常态”之下，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状态。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强调这种常态有别于以往。同时，又强调“常”，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正常的状态。新常态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认识新常态，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趋势、规律。适应新常态，就是要从这种阶段性特征出发，既

要关注的是，“新常态”之下，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状态。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强调这种常态有别于以往。同时，又强调“常”，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正常的状态。新常态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认识新常态，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趋势、规律。适应新常态，就是要从这种阶段性特征出发，既

要关注的是，“新常态”之下，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状态。新常态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强调这种常态有别于以往。同时，又强调“常”，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正常的状态。新常态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认识新常态，就是要深刻认识和把握一个阶段、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趋势、规律。适应新常态，就是要从这种阶段性特征出发，既

## E 实践与思考

### 一是制度先行，构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新规范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制度规范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保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我市始终坚持“制度先行”。比如，为指导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制定了《宁波市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指南》；为持续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建设，实施了《宁波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动态管理办法》；为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对推进基层民主法治的作用，出台了《宁波市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意见》。此外，为规范基层群众自治，指导全市2567个行政村中98%以上的村建立健全了适合各村实际，以村民自治章程为核心，上与国家大法相吻合、下与本村实际相结合的村级规章制度体系，并把一系列规章制度编辑成册下发，或统一印制上墙。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规范依据。目前，全市已指导帮助农

当前，我市的社会治理已经形成

村、社区建立健全重大事项依法民主科学决策、重要事项提请审议、农村（社区）事务民主管理、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村（居）干部任期、民主评议和离任审计等各项制度，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 二是敢为人先，创造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新经验

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方面，我市“敢为天下先”——“民主法治示范村”开全国先河，“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领跑全国，这些既是叫得响的“宁波名片”，更是宁波基层社会治理的时代缩影。不仅如此，各县（市）区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实践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如余姚市“阳光村务八步法”步骤；奉化市在全市农村推行村级重大事项“五议决策法”；象山县建立的“村民说事”制度；镇海区实施了《宁波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动态管理办法》；为充分发扬法律顾顾问对推进基层民主法治的作用，出台了《宁波市建立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实施意见》。此外，为规范基层群众自治，指导全市2567个行政村中98%以上的村建立健全了适合各村实际，以村民自治章程为核心，上与国家大法相吻合、下与本村实际相结合的村级规章制度体系，并把一系列规章制度编辑成册下发，或统一印制上墙。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规范依据。目前，全市已指导帮助农

当前，我市的社会治理已经形成

朱全宝

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社会治理新格局。一方面，以制度和规则保障治理主体间的和谐共赢；另一方面，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2012年，宁波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公益项目交流平台。作为一个公益需求、公益资本、公益生产的集聚中心，每一个有意参与社会公益的社会主体和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其推出的第一批重点招标项目中，民间社会组织申报了80%的项目，服务内容多是满足外来务工儿童、失独老人、贫困大学生、盲童等各类特殊人群的需求。这些来自社会组织的义工们，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挑起大梁，构建了一种社会治理的全新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基层法治促进员1860人，解答政策咨询、开展法制教育、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等10万余次(起)，成为维护和谐稳定、推进法治宁波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坚持载体引领，巩固基层治理的最新成果。早在1998年，我市即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它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如今，经过十七年的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已经成为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基层法治化水平、增强干部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综合载体。通过“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我市各地农村90.6%的村达到了“治安安全村”的标准，基本实现矛盾纠纷“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困难不上交”，矛盾纠纷受理率达100%，调解成功率98%。

(作者为宁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 “五新”助推宁波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朱全宝

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元社会治理新格局。一方面，以制度和规则保障治理主体间的和谐共赢；另一方面，注重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法治化中的功能。2012年，宁波市公益服务促进中心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公益项目交流平台。作为一个公益需求、公益资本、公益生产的集聚中心，每一个有意参与社会公益的社会主体和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其推出的第一批重点招标项目中，民间社会组织申报了80%的项目，服务内容多是满足外来务工儿童、失独老人、贫困大学生、盲童等各类特殊人群的需求。这些来自社会组织的义工们，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挑起大梁，构建了一种社会治理的全新模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基层法治促进员1860人，解答政策咨询、开展法制教育、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等10万余次(起)，成为维护和谐稳定、推进法治宁波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坚持载体引领，巩固基层治理的最新成果。早在1998年，我市即在全国率先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它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如今，经过十七年的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已经成为扩大基层民主、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基层法治化水平、增强干部群众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综合载体。通过“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我市各地农村90.6%的村达到了“治安安全村”的标准，基本实现矛盾纠纷“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困难不上交”，矛盾纠纷受理率达100%，调解成功率98%。